

中华书局 100 多年的兼并小史

■余佐赞

不捐细流，何以能成大江大河甚至大海。100 多年的企业，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是充满了坎坷，虽然有危机的时候贱卖资产，但更多的时候是不断地兼并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壮大，才能根深树老，以至百年和百年以上。以出版界的中华书局为例，1912 年且成立时，中华书局资本金是 2.5 万元，五年不到，1916 年资本金已经是 160 万元。到了 1949 年 5 月，中华书局资本金为 400 万元。

经营奇才陆费逵让中华书局初露峥嵘

中华书局 100 多年的发展中，从小到大，自身壮大的同时，也在不断兼并其他公司。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是一位经营奇才，他先后收并了文明书局、国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局。

先说文明书局，这是陆费逵的老东家，他曾担任文明书局襄理，之后自文明书局去了商务印书馆，再从商务印书馆独立出来创办中华书局。文明书局比商务印书馆更早出版教科书，文明书局第一本教科书《蒙学课本》在其创办之初的 1902 年就出版了，而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本教科书《最新国文教科书》是 1904 年 12 月出版的。随着 1912 年中华书局成立，教科书市场竞争更加激烈，文明书局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。1915 年，文明书局发生火灾，让以书画出版为主的文明书局受到极大损失，碑帖字画悉数被毁，经营困难，当年即被中华书局盘入。陆费逵和陈协恭等创办中华书局时，得文明书局经理俞复很多帮助，由中华书局盘进文明书局也就理所当然。中华书局收购文明书局后，文明书局的招牌依然在出版图书。民国六年(1917 年)，突然出现存户听信谣言而集中提取存款的挤兑风潮，造成流动资金短缺，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，史称“民六危机”。当时，文明书局被作为质押以度时艰，后被中华书局

提前赎回。1932 年 9 月 7 日，文明书局登报通知寄售客户：“本局结局在此，现在屋已退租，希于 9 月 20 日以前前来结算，收回未售件，过期代捐慈善机关，不再通知。”至此，文明书局完全并入中华书局。文明书局当时培养了很多中华书局的高级职员，除了陆费逵、陈协恭，还有沈知方和沈鲁玉等人。

国立图书公司是于右任为主创办的图书出版公司，具体创办时间却有多种不同说法，当前刊行的“于右任年谱”说：1915 年，37 岁，“于右任创办国立图书公司刊行善本丛书，同时作为讨袁的掩护”。但核郑孝胥日记，其实国立图书公司在 1912 年就已经成立了。当时，商务印书馆的郑孝胥对国立图书公司的成立非常关心，其 1912 年 7 月 31 日日记写道：“张继、胡汉民、熊希龄、于右任、汪兆铭等发起国立图书公司，招股百万，编译、印刷二部已成立，此商务印书馆之劲敌也。”说国立图书公司成立于 1912 年 7 月，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，也和现存图书版权页上的时间比较相称。早期的国立图书公司出版图书很少，于右任因为揭露宋教仁案被通缉，逃到日本后，得知日本学者在明治维新后重视西洋轻视中国古籍，将一些过去流传到日本珍贵古书随意处置。当时清廷驻日公使的随员杨守敬为了保存中国典籍，广为搜罗，并在东京就地精印了《古逸丛书》100 部。对这事于右任印象很深，从日本返回后，决心以刊印善本丛书为国立图书公司的目标。他出重资将中国图书公司最新式的印刷机器转盘过来，他自己总负责，康心如为总经理，张季鸾为编辑，开始张罗印刷古逸丛书。但因兹事甚大，做成不易，加上革命家终究难耐书斋的寂寞，最后国立图书公司也就盘给了中华书局。

1916 年，聚珍仿宋体的铅字铸成后，因字体秀丽古雅，极似宋刻而受到出版界、印刷界的赞誉。丁三在和丁辅之弟兄便在上海创设聚珍仿宋印书局（有人讹为聚



珍仿宋印书馆)，书局成立后主要从事代客印筒帖、名片等业务。起初，丁氏拟与商务印书馆合作，并于 1917 年为商务印书馆排印过《大观录》《习苦斋诗集》《居易堂集》等诗文集。因商务印书馆想取消“聚珍”二字，丁氏不肯。1919 年起，中华书局确定盘入聚珍仿宋印书局，并保留“聚珍”二字。1920 年 6 月，双方议定 2.6 万元的盘入金额，1921 年始议妥全部条件，正式订立合同，当年 6 月 6 日的《申报》刊登了聚珍仿宋印书局的启事：“本局已并入中华书局总厂，以后关于法律上权利义务完全由中华书局代表。”1921 年，中华书局《四部要要》用聚珍仿宋字体排印，出版后受到社会的喜爱，中华书局因为仿宋字体深受受欢迎，1921 年还特意成立了“名片部”承揽业务，获得了很大的社会效果。

时代机缘使中华书局成为古籍出版的龙头

以上说的是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前盘进的几个出版公司，



左图：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《蒙学外国地理教科书》
上图：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 1 版 1 印《宋元戏文辑佚》

都是在陆费逵手上完成的，后来爆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中华书局的经营进入了一个动荡期，一直到 1949 年后，兼并历史又有了新的内容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，中华书局的出版方向一变再变。1950 年，国家出版会议初步商定，中华书局出版方向是医药卫生以及农业书。1952 年 10 月，教育部和出版总署统一成立了专门的教科书出版委员会，中华书局又失去了教科书这个主营业务，出版专业调整为农业、经济、外国语文，以及中国文史旧书等。确定出版方向后，中华书局开始迎来了第二波兼并的历史。考虑到当时社内农业方面人才缺少，于是中华书局就兼并了新农出版社。

新农出版社成立于 1946 年，农业科学家余松烈与郑广华、邵霖生等是发起人，出版了不少农业科学书籍，对农学教育以及普及农业科学知识起到了促进作用，在当时农业界很有影响。1953 年，新农出版社并入到了中华书局。

公私合营后，中华书局为了配合当时的经济建设，于 1954 年 5 月新组建了财政经济出版社，

同时还保留中华书局的牌子，中华书局同时也迁到北京。一直到了 1957 年，中华书局的出版方向才明确了，也才开始专注于出版古籍。据说是当时的领导人说，中华书局保留下来做中国古籍，商务印书馆保留下来做洋古籍，于是这两个老牌出版社都保留下来了。1957 年 3 月，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，这次并入让中华书局如虎添翼；1958 年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，成立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，中华书局逐渐成为中国古籍出版的龙头老大。

今天知道古籍出版社的人并不多，因为这个出版社存在时间比较短。古籍出版社成立于 1954 年 6 月，是当时出版总署的直属社，社长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，编辑人数不多，但都是声名如雷贯耳的大家，有徐调孚、张静庐、章锡琛、曾次亮、丁晓先、陈乃乾、陆高谊等。1956 年 12 月，文化部根据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的指示，拟加强中华、商务的出版工作，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将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，组成中华书局的编辑部。1957 年 3 月，这个成立不足三年的古籍专业出版社并入了中华书局。

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 1956 年 11 月，是由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分出扩大组成，以编辑出版中国古代文学书籍及今人对古典文学研究论著为主，也兼及古代历史、哲学等方面的古籍和论著，该社于 1958 年 7 月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。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图书都是使用中华书局版号和徽标，坊间有说中华书局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不是一个单位，其实都是凿空之言。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编辑出版工作一直到 1978 年上海地方成立古籍专业出版社为止。

经过 1949 年前后各三次的扩张和兼并，中华书局的规模和名气愈发大了，这里有出版人的睿智，比如陆费逵；也有时代机缘，比如 1949 年后出版方向的确定和大手笔合并，以及大批古籍专业人才的调入。从 1958 年到 1978 年将近 20 年时间里，全国古籍类图书出版几乎都由中华书局包办，此举让中华书局成了读者心目中的古籍类读物出版社的不二选择。

(上接第一版)

生命之路的探寻者和开拓者

当我缅怀冯至先生的时候，有些深深刻的事同时涌上心头。1980 年代初，北京一些单位经常放映“内部电影”，外国文学研究所也经常组织外国影片的观摩。刚刚冲出精神禁锢的知识分子都感到了一种“文化饥渴”，所以每当放映“内部电影”时都是一票难求。冯先生是外文所所长，当然会有些赠票，他腿脚不便，自己又不去观看，因此“少不更事”的我就经常打电话去向他索票，而结果都是每求必应。我敲他家的门之后，经常是取完票就走，既不问候老人家的起居，也不向他请教学问，回想起来深为当年的孟浪而懊悔。我不仅自己多次打扰冯先生，有时还

带着媒体去骚扰他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台湾地区某影视公司要拍一组大陆老作家的录像，总片名似乎是《现代诗情》，其中当然也要采访冯至。我用“当然”二字，是因为冯先生在中国台湾、香港的影响力不小。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出版社曾出版过收录冯至作品的《现代中国诗选》。1970 年代末，收录了冯至作品的《中国现代诗》成为台湾地区的“大学用书”。1990 年代初，我还在台湾地区的《文讯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《学贯中西、创作多面的冯至》的文章，后收入我的《五四文坛鳞爪》一书，1998 年 9 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。为了安排好这次采访，我还特意请来了冯先生的老友卞之琳先生。台湾影视公司的人一大早就到了冯先生的客厅，摆摄像机，调灯光，挪动桌椅，折腾了好久。后来请冯先生出场，讲自己的创作生涯，回答各种问题，还让他当场朗读了一首代

表作《蛇》，临近中午才收工。冯先生将自己的一些书签赠给摄制方，但摄制方不但没有支付任何报酬，而且也没请冯先生吃一顿工作餐。我感到很不好意思，便单独请卞之琳先生去一家小饭馆吃了午饭。我们对摄制方的唯一要求，是影片合成之后能赠送一盘录像，他们当时答应了，但事后打听，连这盘录像带也没有寄。冯先生是一位爱惜光阴的人，深感岁月日减，越来越迫切地感到应该做的事还很多，但像我这样不仅自己去打扰他，还带人去打扰他，实在是一种罪过。

行将结束本文的时候，不禁又想到冯至《十四行集》中那首关于“路的哲学”的小诗，每当读到，我都会联想到鲁迅小说《故乡》的结尾，也会联想起鲁迅的随感录《生命的路》：

你说，你最爱看这原野里，
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，

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，
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。

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，
也有几条婉转的小路，
但曾经在路面上走过的
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。

寂寞的儿童、白发的夫妇，
还有些年纪青青的男女，
还有死去的朋友。他们都

给我们踏出来这些道路，
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，
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。

在生命的征途中，冯至先生是探寻者，也是开拓者。我们纪念他，就要珍惜他用艰难步履踏出来的路，让这条路不但不荒芜，而且越走越宽阔。